

论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研究的互文性

赖彦斌 张国龙

[摘要]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关系密切,主要体现在民间文学资源与儿童文学读本、儿童文学创作的关系方面。在现代学科发展史上,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与儿童文学研究都发端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学科间互文共建的基础。虽然作为两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具有学科分野,在现代学科发展的一定阶段阻碍了互文共建,即儿童文学学科重点关注作家文学作品,而民间文学学科重点关注中下层文学,在中国建设民间文艺学,贴近民众的生活和文化,成为民俗学研究的一部分。但是,从两学科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势看,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互文共建势在必行。一方面,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者需有意识地加强两个学科的互文共建,共同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相互借鉴,共同促进跨文化对话,讲好中国故事,为提升文化软实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民间文学;儿童文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交叉学科研究;互文共建

[基金项目]20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22&·ZD275)。

[作者简介]赖彦斌(1975—),男,民俗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高级工程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张国龙(1972—),男,儿童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人类社会在文字产生之前,就有了口头的民间文学。中国有许多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历经千百年流传至今。在这些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中,例如神话、传说、幻想故事、动物故事、寓言、童谣等,有相当一部分适合儿童接受或对儿童具有教育意义。它们是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共享资源,也是民间文学学科和儿童文学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作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都萌芽于晚清,诞生于“五四”时期。学科研究的先驱者们,因有神话、童话和儿歌等共同的传统资源和共同的研究对象,往往同时在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治学,如周作人、郑振铎、茅盾等。他们搜集、整理和改编民间文学,进行儿童文学创作,进行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和儿童文学的研究,为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研究互文共建奠定了学科基础。但在学科发展史上,因各有学术目标和

价值旨趣,儿童文学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在不同的二级学科下建设,在一定阶段上又阻碍了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互文共建。当下,需要对中国文化进行整体研究,学科综合研究亦势在必行。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具有可行性,二者互文共建,可以共同为文化整体研究和学科综合研究,以及促进跨文化对话、讲好中国故事作出贡献。过往有关民间文学为儿童文学提供研究资料和创作素材的研究比较多,而对于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学科差异以及互文性研究较少。本文尝试从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密切关系、现代学科发展和互文共建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密切关系

就作品而言,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都属古已有之。中国有历代积累的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其中不少作品适合儿童接受和对儿童具有教育意义。中国古代民间文学作品既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资源,又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具体表现在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读本、儿童文学创作的关系方面。

(一)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读本

本文所谓“儿童文学读本”,是指提供给儿童阅读的文本,包括口头文本和书面文本。从儿童文学读本的角度讨论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意指有相当部分民间文学作品和儿童文学读本是交叉重叠的,即共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所共享的文化资源都具有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审美情趣和具有教育儿童的特点;另一方面,民间文学作品是儿童文学的重要创作素材,而儿童文学创作作品的传播反过来也使民间文学得到更广泛的传承。值得深究的是民间文学作品何以能成为儿童文学读本?哪些民间文学作品可作为儿童文学读本?

民间文学作品口耳相传。孩子在襁褓中,在月色下,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着长辈讲“过去的事情”,伴着“风儿轻,月儿明”“小耗子上灯台”等歌声,逐渐长大。这些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是儿童接触到的口头的儿童文学读本,直接源自民间文学。在中国古代,还有少数文人创作的书面儿童文学读本,也常常利用民间文学加以二次创作,但这些民间文学作品,经由古代文人特意挑选甚至改编后作为启蒙读物,注重伦理道德教育,只强调教训而不考虑儿童的身心特点。晚清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白话文的推广,西方科学与民主理念以及现代教育理念的引入,大大提高了民众接受书面教育的普及率,书面读本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无论是儿童文学的研究者还是民间文学的研究者,都特别看重儿童教育之于“开启民智”的重要作用,积极参与编写儿童文学读本,为儿童教育所用。其中,搜集、整理和改编民间文学作品,是儿童文学读本的重要资料来源。这些民间文学作品何以能成为儿童文学读本呢?

一方面,这些民间文学作品符合儿童成长和认识世界的规律,符合儿童的审美情趣。

以民间文学中的神话为例。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民间文学作品,它反映了原始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原始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当时的社会形态。神话中充满了天真奇幻的想象,“在‘万物有灵论’思想的支配下,所有的自然物和自然力都被人格化、神化了”。^①神

^①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

话的这种特点,与儿童认知世界时将世间万物与自己类同的思维方式很相似。其中的奇幻形象和生动情节,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和阅读趣味,神话自然就可以成为儿童读本的重要素材。不过,人们对于神话的性质及其作为儿童读本的价值,却是在晚清以后才逐渐被认识到的。钟敬文曾对晚清民间文艺学史做过评述,总结了历代学者对神话的认识和晚清学者所提出的新见解的现代科学启蒙意义。^①他认为鲁迅较早地指出了对待古代神话的科学态度,应是“迷信它固不必,否定它也是愚蠢”。^②这种新见解已具有现代科学的启蒙意义,一直到“五四”前后学者的讨论中,实际上是对神话是否能够成为儿童读本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周作人指出了神话作为儿童读物的价值,批判了“神话是迷信”的观点,提出“神话在儿童读物里的价值是空想与趣味,不是事实和知识”。^③“空想与趣味”是指对儿童想象力和审美情趣的体认。也就是说,神话作为儿童读本的素材,是符合儿童认知思维的发展特点和儿童审美情趣的。“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拜物教的,他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正是当然的事。”^④周作人认为儿童与初民的心理相似的观点,受到了英国人类学的启发。^⑤他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神话、童话、儿歌等民间文学中的儿童文学,注重“原始心理”研究。^⑥换句话说,神话思维与儿童思维的相似性,使得神话文体可以作为儿童文学读本。

另一方面,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对儿童具有教育作用。具有代表性的是民间故事中的幻想故事,即民间童话。幻想故事在教育儿童方面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可以使儿童在艺术的陶冶中受到品德教育和美学教育”。^⑦品德教育主要是指思想内容健康和有较高艺术性的幻想故事,适宜儿童欣赏和阅读,如《叶限》(即《灰姑娘》)、《老虎外婆》和《田螺姑娘》等。美学教育主要是指幻想故事中的想象成分和儿童喜欢幻想的心理特点接近。因此,幻想故事可以成为儿童文学读本,对于启发和开拓儿童的智力具有重要作用。民间文学对儿童的教育作用是顺其自然的,并非说教者强加其中的“教训”。周作人曾指出童话对儿童有三方面的教育作用:“助长儿童的自然发育”“培养儿童的想象力”“为儿童的社会化做准备”。^⑧他反对传统蒙学读本中的“训戒”和“敷陈道理”,这些教训和道理并不是儿童所能理解的,不仅使儿童失去兴趣,而且失去了教育儿童的价值。赵景深进一步解释说:“因为儿童对于儿童文学,只觉得他的情节有趣,若加以教训,或是玄美的盛装,反易引起儿童的厌恶”^⑨。茅盾认为儿童文学读本应是教育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儿童文学应该要有教育性,但这种教

① 20世纪60年代前期,钟敬文撰写了晚清民间文艺学史的重要论文,包括《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收入钟敬文:《钟敬文全集》第五卷第13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9—152页。

② 钟敬文:《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钟敬文全集》第五卷第13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8页。

③ 周作人:《神话的辩护》,《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页。原载《晨报副刊》1924年2月29日。

④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2页。原载《新青年》第八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⑤ [美]洪长泰(Chang-tai Hung):《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董晓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9—140页。

⑥ 张国龙:《中国新文学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价值旨归》,《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⑦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56页。

⑧ 周作人:《童话略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2—43页。原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2号,1913年11月15日。

⑨ 赵景深、周作人:《童话的讨论》,赵景深:《童话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第65页。

育性应当包含在艺术的形象中。^① 在现代化时期,人们对工业化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恶化进行反思,发现民间文学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还有助于儿童亲近自然,树立正确的生态教育观。在全球化背景下,儿童更容易接触到多元文化,也容易造成儿童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甚至“遗忘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与英雄原型”。^② 而神话、童话等民间文学作品不仅包含了人们对自然的认知,还有人们对本民族历史的认识,也有对信仰和习俗的记录,以及对历经几千年世代传承所凝聚的民族文化的体认。因此,民间文学转化为儿童文学读本,有助于儿童在听故事和读故事中了解本民族历史和增强民族自豪感。

厘清了民间文学作品何以成为儿童文学读本,接下来谈谈哪些民间文学作品可作为儿童文学读本。

周作人提出民间童话用于儿童文学读本的标准,要符合“优美、新奇、单纯、匀齐”四点。^③ 他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提出了选择民间童话的标准。在内容上,故事情节要新奇,故事结构和故事人物要单纯;在形式上,故事讲述要具有自然美、不造作,简洁、不拖沓。赵景深总结“五四”前后刊物发表的儿童文学读本,认为当时在对民间童话的采集、筛选和改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涉及民间文学用于儿童文学读本的原则,他提了五点意见:改写不易理解的口语方言、把字句写得更加浅显明白、以仙子和太子公主的故事最合宜、排除掉鬼和恶魔等恐怖成分、多采用动植物故事;还提出改编童话的原则是“质料依旧是神话和传说的材料,不过严肃和敬畏的分子是没有了”。^④ 周作人对此表示认同,并提出不适合作为儿童文学读本的两点原则:一是对儿童身心发展有害,二是对人类道德有害。^⑤ 鲁迅从接受者的角度,以发展的观点,将民间文学作品放到社会教育环境中去考察:“这要看社会上教育的状况怎样,如果儿童能继续更受良好的教育,则将来一学科学,自然会明白,不至迷信,所以当然没有害的;但如果儿童不能继续受稍深的教育,学识不再进步,则在幼小时所教的神话,将永信以为真,所以也许是有害的。”^⑥

总之,现代学者基于现代儿童观整理民间文学等传统资源,提出哪些民间文学作品可作为儿童文学读本;或者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哪些质素可作为儿童文学读本。也就是说,从民间文学作品到儿童文学读本需进行取舍和改编。整体上看,民间文学因其集体性和口头性特点,便于自然而然教育儿童,且易于儿童接受。但经古代文人的收集和辑录往往将其文言化,反而损害了儿童的接受度。长期传承的民间文学也难免地附着历史印记,在讲述中不可避免地承载过重的历史思想和规训儿童的旨意。因此,大多不能直接转换为儿童文学作品。利用古人收集和辑录的民间文学资源,转化为儿童文学读本,需要改写和转译成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和体裁。

以商务印书馆 20 世纪初出版的儿童读物《童话》丛书为例,其中包括相当部分的民间文学作品,主要是改编中国历史故事和翻译外国的童话、寓言、民间故事等。从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几

① 茅盾:《几本儿童杂志》,《文学》1935 年第 3 期。

② 肖艳华:《神话题材类儿童读物的实践形式与教育赋能》,《中国出版》2021 年第 14 期。

③ 周作人:《童话略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年,第 43 页。

④ 赵景深、周作人:《童话的讨论》,赵景深:《童话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29 年,第 56 页。

⑤ 赵景深、周作人:《童话的讨论》,赵景深:《童话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29 年,第 59 页。

⑥ 鲁迅:《从神话到神仙传》,《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315 页。

种儿童刊物看,《儿童教育画》《少年》《儿童世界》《儿童画报》等都刊登歌谣、童话、寓言等民间文学内容。孙毓修、茅盾、周作人、鲁迅、叶圣陶和郑振铎等积极采集民间故事和传说,整理童话和童谣等民间文学,并开展相关的研究,为民间文学作品转化成儿童文学读本作出了重要贡献。到了 21 世纪,在儿童文学读物和小学语文教材中,民间文学素材仍占有一席之地,但比重不多,经过了编者的筛选和改编。以 2020 年人教版的小学语文教材为例,主要是在低年级教材中选用儿歌童谣和少量神话,中年级教材中选用寓言故事和神话,高年级教材中选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的民间故事。如鲁智深的故事、武松打虎的故事、孙悟空的故事等。这些民间文学作品由主编者精心挑选以符合现代教育目的,如经典神话《大禹治水》《盘古开天辟地》《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

(二) 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创作

在供给儿童的读本中,除搜集、整理和改编民间文学作品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儿童文学创作。“五四”之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开始起步,受安徒生等外国儿童文学作家创作实践的影响,首先以翻译、模仿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和改编古代传统读物为主。在此基础上,本土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不断发展。这两个阶段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都是基于中国文化本位立场,吸取中国文学传统和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的双重营养,且与中国民间文学资源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文人学者改编自古代传统读物而生成的儿童文学作品,与民间文学的密切关系显而易见。而文人学者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作家文学,虽然与民间文学相区别,但也有联系。从总体上说,“民间文学是滋养新的作家文学永不枯竭的清泉”。^①从相互影响上说,一方面,民间文学为作家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故事题材、健康的思想内容、深入人心的典型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以及各种文学体裁、比兴等艺术手法、通俗易懂的民间艺术语言等。另一方面,作家文学通过对民间文学的再创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存、提炼和传播了民间文学,而且还深化了原有民间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提高了它们的美学价值。

儿童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学的主要联系:一是对民间文学素材的利用,二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特点的借鉴。自“五四”以来,儿童文学创作利用民间文学素材,实际上是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再发掘和再阐释。“五四”时期,安徒生童话受到推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范本,也是利用民间文学素材、对民间文学资源进行再发掘和再阐释的典范。赵景深认为,安徒生的童话创作,既是“文学的童话”,也是“教育的童话”。^②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并非一味照搬和简单模仿外国儿童文学,而是紧扣中国社会现实,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寄寓了创作者的社会理想。开中国童话创作之先河的叶圣陶,虽然没有直接利用民间文学素材,但仍借鉴了中国民间故事的叙事模式,如三段式和反复等。茅盾特别重视利用民间文学素材,他在任商务印书馆《童话》的编辑时,创作的童话近半数是根据外国童话、寓言或民间故事加以改写的。他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世界》杂志上发表了 10 篇希腊神话译作与 6 篇北欧神话译作,并对每篇译作做了点评。儿童文学创作者利用民间文学素材,往往保留其幻想性、人物形象或主要故事情节,并注入时代性元素,使儿童文学作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例如,有学者对葛翠琳 1949—1966 年的儿童文学创作做了分析,认为葛翠琳的多部儿童

①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8页。

② 赵景深:《研究童话的途径》,赵景深:《童话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第3页。

文学作品运用了神话资源,把对现实的思考融入其中,进行创造性转换,神话资源被注入了“全新的革命意涵”。^①在儿童文学创作对民间文学艺术特点的模仿方面,童话创作越接近民间文学,则越接近于儿童的发展特点和阅读情趣。赵景深认为:“若要童话最合儿童的心理,莫如民间的童话,文学的童话总及不上。”^②他比较了安徒生、王尔德、爱罗先珂的童话创作,认为“就文学的眼光看,艺术是渐渐的进步,思想也渐渐进步了,但就儿童的眼光去看,总要觉得一个不如一个。或者以这样的步骤(安王爱)供给渐长的儿童(自童年至少少年壮年)倒还容易引起他们爱好一些”。^③

二、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现代学科发展

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民间文学,都萌芽于晚清,诞生于“五四”,学科起点很高,发展道路很曲折,起起落落,都是“边缘”小学科。学科研究的先驱者们,因有神话、童话和儿歌等共同的传统资源和共同的研究对象,往往同时在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治学,如周作人、郑振铎、茅盾等。不同的是,儿童文学学科始于“儿童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现代成人文学同属现代文学学科的理论框架,又具有与成人文学二元分立的独立特点。现代的儿童文学学科需要从传统的民间文学资源中汲取营养,更需要有意地从“儿童本位”意识去创作,重点关注作家文学作品,包括作品的创作和批评。民间文学学科(即民间文艺学)始于“民众意识的觉醒”和“到民间去”的民间文学运动,民间文学被纳入到文学史中。民间文学有着与作家文学很不相同的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特点,更贴近民众的生活和文化,从而成为民俗学研究的一部分。

(一) 儿童文学主要属于作家文学

在历史语境下的儿童文学,即可供儿童阅读、在儿童中流传和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文学资源,其中很大部分源自民间文学,但它们都不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一方面是理论研究,如周作人等学者所做的讨论。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提出“儿童文学”概念。^④另一方面是儿童文学创作,如叶圣陶等作家的童话创作。

儿童文学主要属作家文学,讨论的是儿童文学中的“文学性”。儿童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作家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适合儿童阅读,也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叶圣陶创作《稻草人》等童话,用适宜儿童阅读的浅明的文字来写,同时“却不自禁地融凝了许多‘成人的悲哀’在里面”。^⑤郑振铎认为,“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可以说是应该的。”^⑥曹文轩也说过:“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⑦因此,儿童文学主要属作家文学,是作家有意识地创作适合儿童阅读、符合儿童审美情趣和对儿童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儿童文学作家要有一颗童心,尽量秉持“儿童本位”观创

① 毛巧晖:《神话资源现代转换的话语实践——以葛翠琳 1949—1966 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为中心的讨论》,《文化遗产》2021 年第 2 期。

② 赵景深、周作人:《童话的讨论》,赵景深:《童话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29 年,第 73 页。

③ 赵景深、周作人:《童话的讨论》,赵景深:《童话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29 年,第 74 页。

④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年,第 22 页。

⑤ 郑振铎:《稻草人·序》,叶圣陶:《稻草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4 页。

⑥ 郑振铎:《稻草人·序》,叶圣陶:《稻草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6—7 页。

⑦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65 页。

作儿童文学作品。虽然常常从民间文学中吸取养分,进行改编和再创作,但作家创作的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有两点主要区别。

其一,作家所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势必会打上作家个人的印记;而民间文学作品是由民众集体创作与传承,自然而然地反映民众的精神活动,带有时代烙印。虽然作家同样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但作家个人的创作意识在作品中起到主要作用。作家无限接近儿童本位但无法把自己变成儿童,正如郑振铎所说:“实在的,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似乎是不可能的企图。”^①

其二,作家所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是追求文字优美的上层书面文学;而民间文学是中下层口头文学,艺术特点是刚健清新的自然美。儿童文学作家虽然尽量使用浅明的文字来写作,但在文字表达上讲究词句优美,认为这是作品对儿童进行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势必要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的个性研究和作家研究。这与民间文学的学科研究是不一样的。民间文学研究虽然也重视对传承人的研究,但因传承人的传承活动并不产生新文本,重点研究传承人的即兴表演。

综上,儿童文学在“文学性”维度上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相似,属作家文学的研究范畴。而儿童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下建设,也就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儿童文学又因在“儿童性”维度上有别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成人文学”,而在学科发展上具有独特性,且在利用传统文化资源的民族性上与民间文学相联系。只不过强化“儿童性”仅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显然是不够的。更何况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不能直接作为儿童文学读本。这就需要作家有意识地创作适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儿童文学。基于此,儿童文学学科的学术旨趣与民间文学相异,而与作家文学相近。当然,儿童文学学科研究不仅包括儿童文学作品的批评理论,还包括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而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儿童文学的研究也更倾向于对儿童文学创作的研究,而只是把民间文学作为传统资源看待。从儿童文学学科研究的角度说,“儿童文学其实是成人创造,反映着成人的思想、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② 透过作家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成长环境等研究儿童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意识形态,这是儿童文学研究所要关注的问题,却不属民间文学研究的学科范畴。民间文学的研究虽然也关注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互动,但主要关注民俗、社会制度、民众思想史和民众精神史。在学科归属上,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即民间文艺学)虽与儿童文学同属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但儿童文学主要研究作家文学,而民间文艺学主要研究民间文学文本。同时,民间文学作品的文化研究部分是民俗学的研究内容之一,则归入社会学一级学科进行建设。

(二)民间文学与民俗学

经过晚清的萌芽,到“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兴起,促成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研究。钟敬文在1935年首次提出“民间文艺学”概念,并提出要成立这门独立的新学科。^③ 他当时是以作家文学为参照,把作家文学和书面文学称为“普通的文艺”或“一般文艺”,把民间文艺看作一

① 郑振铎:《稻草人·序》,叶圣陶:《稻草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4页。

② 吴其南:《代际冲突与文化选择》,兰州: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第24页。

③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12页。

种“特殊的文艺”，有着“很不相同之处”，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他提出要“把这种文化的事象，作为一个对象，而创设一种独立的系统的科学”。^① 他所说的“很不相同之处”，主要是指民间文学区别于作家文学的主要特征，即集体性、口头性、类同性和素朴性^②。

在中国，以民间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包括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两门学科。其中，民间文艺学重点进行民间文学的文本分析和相关的民俗文化内涵分析，这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有着一定程度的相联性，也与儿童文学的研究有相同的传统文学资源基础。而民俗学重点研究民众的生活传统、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这些内容不是儿童文学研究所关注的，也不必关注，但可以为儿童文学研究提供社会文化环境的分析。在现代民俗学史上，民俗学的兴起是从搜集民间文学开始的，其中也包括传统儿童文学资源，例如德国的格林童话、芬兰的史诗《卡勒瓦拉》等。在中国，“五四”时期的歌谣学运动也是从搜集民间歌谣、谚语、神话、传说和故事等民间文学开始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在学科发展道路上相互促进，关系密切。20世纪40年代以后，民间文学成为新文化体系建设的一部分得到重视，民间文艺学得到较好的发展机会，在学科建设上也带动了民俗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传统文化研究重新受到重视，民俗学学科建设得到恢复。钟敬文提出了文化三层观，指出民俗学是以研究民间文化为核心的人文学科，并提出“民俗文化学”的概念^③。以文化研究为重点，民俗学研究得以恢复，译介国外民俗学理论加以应用，在学科发展上带动了民间文艺学的发展。这时的儿童文学研究也同处文化研究的热浪中，着重对作家文学及其文化的研究。民间文学研究是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民俗学二级学科，民间文学作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民俗学在社会学和中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下建设，民俗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给民俗学带来了新视角和新成果。2015年国家学科目录进行调整，民俗学只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下建设，而民间文学研究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建设，成为高校自设的二级学科。

在学科发展的道路上，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属两个同病相怜的“边缘学科”，平行发展而不交叉。这与“五四”时期学科发展的起步阶段时的情形不同。那时如周作人所称的“杂学”，钟敬文称之为“文化诸科学”，现代人文科学的发展是一种整体的、综合的研究。“五四”时期，周作人、郑振铎、茅盾、顾颉刚、钟敬文、赵景深等的研究，使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几乎成为一种“显学”，学科起点很高，但它们到现在则似乎成了边缘学科。现在看来，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百年学科发展，从整体的和综合的研究，到学科的自觉研究和学科分立研究，再到学科交叉研究和跨学科融合研究，很有必要发展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学术回归，那就是更深入的文化整体研究和学科综合研究。这对于推动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学科发展，应该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①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页。

②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6—7页。20世纪80年代，钟敬文将民间文学特征的提法，修改为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参见钟敬文：《民间文学述要》，《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17页。另见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34页。

③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三、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互文共建

新时代急需对中国文化进行整体研究,亦有必要加强学科综合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具有密切关系,为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也具有必要性。二者互文共建,共同为文化整体研究和学科综合研究作出贡献。一是共同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资源的搜集整理、改造利用和学科研究成果的应用方面加强工作。二是学科间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三是共同促进跨文化对话,讲好中国故事。

(一) 共同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继续加强中国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传统资源的搜集整理工作。中国是一个文献大国,大量历史典籍、地方志、笔记杂纂、通俗小说、戏剧话本和民间宝卷等内含丰富的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资料。“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赵景深、容肇祖等在搜集历史文献中的民间文学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把这些资料作为传统文化资源,运用现代方法予以阐释。而《童话》《少年》《儿童世界》等杂志登载学者搜集的传统儿童文学资源。孙毓修、茅盾等对它们进行改编,使之成为儿童文学读物。中国还是一个口头文学资源丰富的国家,“五四”时期的学者也重视现代口头民间文学资源的搜集整理,如北大歌谣征集处所做的工作等。1979年—2009年在全国开展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志书搜集工作,是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口传民族民间文艺资源的全面普查工作,被誉为“文化长城”。百年来,国家、社会和各界学者在搜集整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与我国丰富的文献和口头资源宝藏相比还不够,从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角度进行的整理工作还有待加强,继而促进这方面的交叉研究也还不多。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工作者更应该继续加强传统民间文学资源的搜集、整理工作,它们对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儿童文学的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起着重要作用。

儿童文学研究和创作要提高对民间文学的重视和利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始于现代儿童观,但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传统民间文学资源。先是接受了西方人类学、民俗学和教育学等理论,反观中国古代文学和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提出“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进而以现代儿童观的理念,从民间文学中寻找儿童文学传统资源,对它们进行挖掘发现、重新解读和整理改编,改造,转换为现代儿童文学资源。在译介外国现代儿童文学作品的同时,充分吸收中国民间文学传统资源的营养,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儿童文学作品。民间文学中深入人心的典型形象和故事情节、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自然天成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很容易被儿童文学借鉴,并以现代儿童教育的理念,重新创作成贴近现代儿童认知特点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是中国古代文人文学和传统教育读物所无法企及的。在新时代,民间文学的这些特点并没有消失,儿童文学的研究和创作仍然可以利用民间文学。例如,张天翼创作的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就是利用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宝葫芦”的前知识系统。作品仅使用了民间文学中“宝葫芦”的故事名,保留了儿童富于幻想的特点,又不脱离现实,让儿童逐步认识到不切实际幻想的害处,最后以“梦”的结局把儿童拉回到现实,实现了比较自然的教育效果。

民间文学研究成果应更好地应用到儿童文学中。儿童文学工作者不仅可以利用民间文学资

源,还可以应用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民间文学工作者也可以把民间文学研究成果应用到儿童文学当中。

其一,民间文学的故事类型研究可应用于儿童文学。故事类型研究是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产生了一套世界公认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国,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开创了故事类型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钟敬文的民俗志书写模式,开创了故事类型的研究理论。在此基础上,一大批学者对中国故事类型进行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故事类型研究成果应用于儿童文学,一是在整理和利用民间文学中的儿童文学资源时,能比较科学地处理众多的异文故事,较好地把握故事的民间“本真性”和“时代性”,找到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转换为现代儿童文学资源的钥匙。二是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在利用和改写民间故事时,能较好地把握主要的故事母题和故事情节单元,以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与民间文学前知识相衔接,自然而然地让儿童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三是在儿童文学研究中,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民间文学给予儿童文学的养分,分析哪些民间文学适合于现代儿童文学,哪些民间文学需要改编,等等。四是在中外儿童文学比较方面,能够较好地了解世界扩布类型的故事和中国特有故事的特点,以便更好地开展儿童文学的跨文化对话。

其二,民间文学的民俗学研究可应用于儿童文学。民间文学的民俗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儿童文学,主要有民俗事象研究和民俗传承研究两个方面。首先,在民俗事象研究方面,民间文学的类型研究主要是民间文学文本的研究,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对文本背后的民俗文化内涵进行研究,也就是要看到民间文学与民俗事象的关系。从范畴上讲,民间文学本身也是一种民俗事象,但此处所说的民俗事象,是指民间文学中所反映的除民间文学以外其他的民俗事象。民间文学“历来密切联系着各种民俗事象,渗透到各种民俗活动之中,成为多种民俗文化的载体”。^①民间文学的民俗事象研究,可以为儿童文学的研究提供民俗文化内涵和社会文化背景,把儿童放在民俗生活中,能更有效地体现“儿童本位”的理念。钟敬文在1928年给黄诏年编的儿歌集《孩子们的歌声》所写的《序》中就提出,仅从歌词文本内容来判断歌谣是儿童所唱还是成人所唱,即使有“编辑者所耳闻目见”,也是不能轻易断定的。^②这就需要民俗学的分析。对当下民间文学的民俗事象研究,也可以应用于儿童文学。有学者提出“儿童民俗”的概念,主要是指童话、儿歌等民间文学和以儿童为主体的民间游戏娱乐,也谈及儿童参与的民俗活动。^③这当然是以儿童为主体的主要民俗事象,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儿童置身于整体的民俗生活中,除上述“儿童民俗”之外,还要考虑儿童在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中学习民俗,儿童文学也可以在其中起到促进或强化的作用。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并不是要把儿童置身于社会生活之外,完全不受成年人的直接影响或正式指导,而是要把这种影响或指导融于儿童能接受的方式,符合儿童的成长规律和发展特点。其次,在民间文学的民俗传承研究方面,其中有关民间文学集体传承中个人创作者作用的讨论、类型传承中历史传承稳定性和民族地域差异性的讨论、口头传承与现代学校教育关系的讨论、口头传承与现代媒体关系的讨论等研究成

①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5页。

② 钟敬文:《关于〈孩子们的歌声〉——序黄诏年君编的儿歌集》,《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80—381页。

③ 张举文:《儿童民俗及其研究探论》,《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果,可以为儿童文学中有关儿童对传统文学资源的接受与自主改编的问题分析,提供一定的帮助。例如,校园“新童谣”的产生与传播。

(二) 研究方法的互鉴可能

民间文学研究与儿童文学研究这两个学科,研究成果可以相互利用以促进学科发展,研究方法也可以相互借鉴。一个学科得以成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该学科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但相邻学科之间的研究方法可以相互借鉴,反过来又能促进各自学科的发展。现代学科研究的发展,一方面要求各学科遵循自身特点深度发展,另一方面要求相邻学科间进行交叉研究。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学科起步和发展,都具有跨学科的属性,需要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支撑。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思想文化、儿童教育、文学和出版产业经济等四个领域的变革皆有关系,儿童文学的研究需要调动哲学(主要是儿童教育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学、经济学(文化产业)等学科的知识。^①从学科意义上说,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交叉学科研究是必要也是可能的。其中,它们在研究方法上可以互鉴。例如,在儿童文学的分级阅读研究方面,可以借鉴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儿童文学的分级阅读,一直是儿童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学者大多提出分级阅读的一些原则,例如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就从儿童成长阶段的角度,提出幼儿前期、幼儿后期和少年时期的分级阅读原则。有学者概括儿童不同阶段的阅读方式,如以早期儿童为主进行亲子阅读的绘本式、以中期儿童为主进行主题阅读的引读式、以青春期儿童为主进行深度阅读的沉浸式等。^②一些学者、出版商和社会组织,甚至还会提供详细的分级阅读书目,并进行年度的更新。^③然而,这些书目分级的实际阅读效果如何?如何考虑分级阅读受地域、城乡和家庭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需要儿童文学工作者做更多实证的调查研究。可以借鉴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采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调查技术,可以深入被调查对象内部取得内部视角,比较有效地获取儿童本身和家長参与的对分级阅读接受的实际效果;还能更实际地了解儿童所在家庭的情况,从外部视角研究分析分级阅读中存在的地域、城乡和家庭差异问题。

(三) 共同促进跨文化对话,讲好中国故事

现代国际民俗学在对民间故事类型的共享问题研究,为当今的跨文化对话奠定了基础。例如,德国的格林兄弟搜集民间童话,芬兰学派在19世纪中期通过对史诗的收集和整编振奋民族精神,还提出了故事类型学方法论,俄国的普罗普提出了故事形态学的故事分类法。钟敬文创造了中国民俗志的故事分类法,还最早进行了中国故事类型的跨国比较研究。各国的民间故事本身是文化多样性的,但是故事类型却可以进行跨国比较和国际共享,对故事类型的研究成果可以成为跨文化对话的基础。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相结合,借助“类型”和“跨国”的概念,利用民俗学的国际化优势,聚焦人类文化中的儿童教育等共享问题,建设跨文化儿童文学,促进跨文化的文明互鉴。要继

① 朱自强:《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范式——以周作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

② 肖艳华:《神话题材类儿童读物的实践形式与教育赋能》,《中国出版》2021年第14期。

③ 例如,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自2017年发起“爱阅童书100”项目,每年评选当年在国内出版的适合6—12岁儿童阅读的100本童书和10本教师用书书目,并按小学1—2年级、3—4年级、5—6年级做了分级。在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官方微信发布的2021年度书目中,介绍书目评选的专家团队是“由儿童文学、儿童教育、儿童阅读研究、儿童心理、少儿科普、美术等专业领域内专家组成”,评选原则是“以公正、科学、专业的标准”。参见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官方微信:《收下孩子的年度书单 | 2021年度爱阅童书100正式发布!》, <https://mp.weixin.qq.com/s/IjacWjV-x8yQAcbsNsisa>, 2022年2月16日。

续做好优秀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和理论的翻译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加强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外向翻译。用好民间文学资源,用故事类型进行跨文化对话,以儿童文学作品为媒介讲好中国故事,是进行跨文化对话的有效方式之一。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生的,人类学、进化论、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等西方理论的传入,丹麦的安徒生童话、英国的王尔德童话和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俄国的爱罗先珂童话等西方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在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步阶段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当时的跨文化空间中,只是单向的理论和文化的传播。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史上,学界学人通过对外翻译、国际研讨和书写世界儿童文学史等工作,一直努力将中国儿童文学带入到世界儿童文学视界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无论是儿童文学作品,还是儿童文学的研究成果,在当今跨文化对话中的中国声音还不多。2016年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他的代表作《草房子》等走向世界。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契机,首先是儿童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进而是儿童文学研究的交流,在跨文化对话中是对等的双向交流。

跨文化对话的基础是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是在承认文化间差异的前提下的共享问题。目前,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把此类讨论归为“比较儿童文学”,主要包括童年经验、生存意识、群体与个体等方面的中西差异。^① 这些差异是跨文化对话的必要性。乐黛云认为,构建多元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跨文化对话是必由之路。^② 运用跨文化学理论,有助于把“比较儿童文学”的研究推向“跨文化儿童文学”的研究。关于跨文化儿童文学中的共享问题,有学者把中外儿童文学的共性概括为“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自然的母题”。^③ 共享问题是跨文化对话的前提,它的深处是对人类生命和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中国儿童文学推向跨文化对话的平台,可以搭载民间文学的列车,因为讲故事是文化交流的共享方式,故事类型是跨文化共享“母题”的一种途径。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共同肩负讲好中国故事的重任,让外国人能读懂中国的故事、理解中国的文化,才能在共享问题上进行跨文化对话。

跨文化对话的立足点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本位。周作人的现代儿童文学观,就是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理论,同时又立足中国文化本位。他关于儿童文学起源的观点受到了英国人类学安德鲁·朗(Andrew Lang)的启发,但他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针对中国的实际问题,用于动员整个社会去明白儿童文学的重要性。^④ 当下,建设跨文化儿童文学,需有全球视野,把中国儿童文学放在世界儿童文学格局中进行对话和交流,而实现的重要途径是在本土民间文学资源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文学的自信,扩展中外儿童文学交流与传播的空间。儿童文学的跨文化对话,以民间文学为底子,以作家文学为形式,共同讲好中国故事。

① 汤锐:《比较儿童文学初探》,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第34页。

② 乐黛云:《跨文化方法论初探》,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第6—16页。

③ 吴翔宇:《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的研究述评》,《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④ [美]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董晓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0页。

结 语

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民间文学作品和儿童文学有相当部分交叉重叠,它们都“共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民间文学作品能够作为儿童文学读本,它们都具有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审美情趣和教育儿童的特点。另一方面,民间文学为儿童文学提供重要的研究资源和创作素材,继而成为儿童文学作品,将民间文学作品书面化,反过来又使民间文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从民间文学到儿童文学,需要进行筛选、改编和现代转译,或者进行重新创作。儿童文学创作者利用民间文学素材,往往保留其幻想性特点、人物形象或主要故事情节,注入时代性元素,使儿童文学作品符合时代要求。而且,在学科发展的道路上,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系统研究同时在“五四”时期起步,学术背景、学者阵容和社会环境等大体相似。在成为独立的现代学科体系后,因学术目标和价值旨趣的不同,两个学科平行发展而不交叉。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百年学科发展,从整体的、综合的研究到学科的自觉研究和学科分立研究,再到学科交叉研究和跨学科融合研究,很有必要进入文化整体研究和学科综合研究阶段。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互文共建,共同为文化整体研究和学科综合研究作出贡献。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者,需共同加强传统文化资源的搜集整理、改造利用,加强对交叉学科研究成果的应用,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研究方法上相互借鉴,共同促进跨文化对话,讲好中国故事。